



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

历史创新体制与 创新型国家建设

邓久根 著



科学出版社

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

历史创新体制与创新型国家建设

邓久根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比较创新体制和历史创新体制的方法论,以三个发达国家在赶超时期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进行研究,并各选取一个当时的主导产业说明,做到史论结合。本书结构如下:第一章为导论部分,说明研究意义与文献述评;第二章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第三章阐述国家创新体系的早期探索。第四章至第六章是主体部分,选取历史上当之无愧的优胜者——英国、美国、德国,阐述它们在赶超时期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第七章为本书的结论部分。首先提炼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经验,然后指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软肋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书适合政府的各级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的相关人员,高校、大中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学生,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科技研发人员及社会大众阅读与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创新体制与创新型国家建设/邓久根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

ISBN 978-7-03-034953-8

I. ①历… II. ①邓… III. ①国家创新系统-研究 IV. ①G3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3021号

责任编辑:马 跃/责任校对:朱光兰

责任印制:阎 磊/封面设计:蓝正设计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年2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3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2 3/4

字数:258 000

定价:5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陈 劲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执行主编：王焕祥 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嘉兴
 学院商学院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虎森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包国宪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陈 平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何自力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罗卫东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孟 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汪丁丁 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
王缉慈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王沛民 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韦 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吴贵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吴晓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姚先国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张旭昆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丛书序一

有幸应邀为这套“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作序。也许没有必要提醒中国读者关于变化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历了众多且巨大的经济结构变迁。政府主导战略下的发展与市场扩张正激励着根本性的技术、制度与社会转型。

为了能够直面一个飞速变化的经济体和动态的全球化世界中的诸多问题与可能性，需要一种可以表达当今我们所目睹的根本性制度与技术转型的经济学。遗憾的是，主流经济学仍然大都指向静态、均衡的“结果”。即使是增长和动态因素被引入主流经济学模型，它仍然假定个体存在一个偏好不变的函数。因此，个体的教育与发展这一关键特性被忽略了。

幸运的是，演化（包含创新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中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替代性研究，其中技术与经济变化是表述的中心。这些研究均可被交叉追溯至凡伯伦、熊彼特、哈耶克和其他几位思想家。纳尔逊和温特在 1982 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又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一个新的冲击。目前，演化与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形成一个广泛的全球网络，其中也包括很多的中国学者。

在这个学术网络内，存在着一个由不同分析方法构成的多样化。不过，他们同时分享着几个共同的假定。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经济变化频繁的世界。但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数量或参数方面，它还包括了技术、组织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大多数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正是因为涵盖这种质变的能力有限而被批评。

第二，经济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新奇的产生。由新奇和创造性而来的多样性及其保持是当代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中心主题。新奇驱动技术与制度演化，但其本质是不可预测性。结果是，现代演化经济学家普遍对预测的可能性持谨慎态度，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的预测是典型地建立在对新奇、不确定性和意外忽略基础上的。

第三，演化经济学家尤其强调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尽管复杂性存在着不同的定义，但大都包含了一个关键性的思想：具有不同特征的实体间的因果互动。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非线性的和混沌的互动进一步限制了可预测性，它们创造了突现特征与进一步新奇的可能性。一般而言，新奇与复杂性的组合使得许多演化

性变迁不可逆。

第四，正如达尔文揭示的，错综复杂的现象没有上帝或人为设计而能够突现。演化经济学家吸收了哈耶克和其他思想家的洞见：许多（即使不是所有）人类制度与其他社会安排无需一个整体计划者或蓝图而通过个体互动自发演化。

第五，演化经济学家通常承认构成经济激励并为创新和发展提供至关重要规则的制度的重要性。经济发展过程的核心是要建立适合有效的制度，包含能够有效提供激励并拓展机会的规则的制度。正因为如此，从本源和新的分析传统来看，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制度经济学家的的工作并且与之有所交叉。

演化与制度经济学为解释现代世界提供了一套丰富的资源，它也是一个重要、开放和动态的理论探究领域，进一步深入研究对其意义重大。我衷心希望这些著作的读者信心百倍地承担起这项使命。

中国的演化经济学研究发展迅速，已经有了自己的演化经济学年会。“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由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精心策划、资助和推出。该中心是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秘书处所在，中国第一份宣传和倡导演化经济学理论范式的专业性学术期刊《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创办于此。我衷心地希望演化经济学能够像此地的民营经济一样蓬勃发展起来。

杰弗里·M. 霍奇逊

英国赫特福德大学

2011年1月25日

丛书序二

演化经济学致力于阐释一个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以促进人们更好地认识技术进步、产业变迁和制度创新发生的过程，从而更好地理解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经济演化过程。因此，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强调技术、结构和制度变迁。

马克思一般被视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前驱。此后，凡伯伦开创了普遍意义上的演化经济学研究，使其成为制度演化分析的本源；而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则使演化经济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后来，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概念，成为演化经济学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出发点，并成为其理论框架的重要基点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演化经济学具有“老的”特征，主张避免使用抽象的理论原理，偏好于某种与传统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不相容的归纳的和跨学科的经验主义方法；而80年代以后“新的”演化经济学与创新经济学与复杂科学的结合，在西方经济学界形成一种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新范式，被经济学界某些学者看做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相并列的经济学三大理论潮流之一，不仅对经济学，而且也对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都产生了比较普遍的影响。新演化经济学试图抓住传统科学的目标，但他们达到目标的途径截然不同，即更加追求通过运用简单的分析原理，理解复杂现实中的时空形态。

按其应用领域及相关研究成果的细分，目前在演化经济学中已经形成了创新经济学、演化发展经济学、演化经济地理学和演化产业经济学等独立的研究分支，具有非常广泛的发展前途。在方法论上，演化经济学更接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以及中国哲学传统的有机整体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演化与创新经济学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生产力学和制度经济学上的发展。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就曾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达尔文的演化论相提并论。

到目前为止，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等都已经成立了演化经济学会，每年举行年会，并出版专业期刊，其学术力量与影响日益成长。中国正处于经济制度与产业技术变迁的历史潮流中，加之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故近年来中国学术

界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显示出了高度的热情,演化经济学学术氛围日益浓厚。自2008年以来,中国演化经济学会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年会秘书处常设于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宣传和倡导演化经济学理论范式的专业性学术期刊《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也于2008年创刊。

从国际演化经济学思潮的发展来看,中国学者有望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而与西方学者获得平等的学术话语权。演化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一种难得的机遇。首先,它不断地吸收现代哲学、生物学和复杂系统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新思想和新方法整合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中,其吸收程度是其他两大经济学体系远不能相比的。其次,它对推动经济学等学科的多元主义发展起到了独特的推动作用,其研究框架、思想和方法使许多经济学研究者倍感新奇和受到启发。例如,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致力于吸收演化经济学的成果,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再次,它为解决中国目前急迫的重大经济发展问题发挥着重大作用,如江泽民同志1998年提出了建设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和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三次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和创新型国家的思想就直接来自于演化经济学,而演化发展经济学则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最后,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研究领域,目前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的队伍还相对弱小,但这对经济学研究比较落后的我国来说,却提供了在世界上后来者居上的难得机遇。中国学者在演化经济学的某些领域,如用演化动力学的观点来研究劳动分工的起源和经济波动的本质,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无疑,演化经济学(包括创新经济学)理论范式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之上的,因此在应用到与西方文化传统相当不同并经历了重大社会经济变革的东方世界时存在着许多新的问题。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和学术传统与演化经济学不断吸收的现代哲学具有许多暗合之处,特别是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大变革对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学术传统提出了某些挑战,所有这些都为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西方学说引入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不立足于国情的理论照搬在理论上难以创新,在实践上也颇具问题;当然,不将本土研究置于国际视野中同样也意味着诸多潜在危机。因此,我们与国际演化经济学界携手举起演化经济学的学术旗帜,并运用它来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乃至全球所面临的发展问题,都内在地包含着学术自主创新的理想与目标。我们不仅主张建立中国原创性的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更加主张直接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倡以案例和经验研究为基础的理论创新。

基于上述国内外学术发展与实践背景,为了推动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发展,加强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学术交流,让更多的学者了解和理解演化与创新经济学,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

中心”与中国演化经济学会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与准备之后，决定隆重推出第一套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丛书的著作者几乎囊括了我国早期演化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诸多学者和后起之秀。丛书题材则集中反映了我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者近十年来潜心研究的努力，希望它有助于广大学者、学子走近并理解演化经济学，投身于中国原创性的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研究中去。

陈 劲 贾根良

2011年1月

前 言

演化经济学的兴起正在形成燎原之势，它是以知识和生产为基础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它把生产、知识、创新、协同、报酬递增和由此所引致的制度变迁看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机制，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创新。创新是一个体系，具有层级性，必须使用系统思维。不同学者从不同层级进行了研究，有微观角度的企业创新体系研究，有中观角度的区域创新体系与部门创新体系研究，有宏观角度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有思想史角度的创新经济学史前史研究。本书的研究属于国家创新体系经济史的范畴，也是对比较经济学的深化与发展，以期为创新经济学研究添砖加瓦。

历史是一幅巨型画卷，徐徐展开，你方唱罢我登场，好像“惊雷总在无声处”，因而追赶是一种常态，本质上是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转。本书以时间为顺序、以空间为视角、以制度为对象，分别对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进行梳理；重点分析对一国赶超有决定性意义的主导产业的领先市场建设，并对每个国家都以一种产业为例进行分析。

本书共七章。第一章为导论，从比较经济学和国家创新体系两个方面进行文献述评。认为新比较经济学仍然是一门不够成熟的学科，处于创立和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独有的范畴和范畴体系，其内容安排还未能构成一个严密的逻辑框架。从研究方法上看，比较经济学最前沿的方法——比较制度分析与历史制度分析，存在的重大缺陷是：虽以均衡作为分析的基点，却恰恰无法解决多重均衡问题；对动态变迁无能为力；无法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进行“宏大叙事”。此外，已有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缺陷有：创新体系研究本身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也没有形成一种共同的学术研究方法，因而极其容易受到攻击；当前对创新体系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说明当代西方的技术创新理论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为新古典经济学“打补丁”的嫌疑，易走向“技术决定论”的极端；研究局限于发达国家的创新体系问题，而对于欠发达国家如何吸取发达国家在赶超中的经验的问题，学界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现阶段的研究都只是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这其实意义不大；创新政策研究中，过分强调供给方创新政策，而需求方创新政策研究几乎被忽略了，其实需求方创新政策对创新的意义更为重大。

第二章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该部分首先从哲学基础、基本假设、认识论、研究主题和政策纲领等角度，对演化经济学与演化博弈论的方法论

进行比较。其次，论述历史与比较创新体制的学术特征：强调国家利益和政府的作用；方法论上主张生物学隐喻和型态化模型；强调经济结构和高质量生产活动的重要作用；强调情景脉络的特定性和历史的重要性；强调科学技术和知识尤其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最后，确定历史与比较创新体制视角下的国家创新体系与创新型国家的研究框架。

第三章主要阐述重商主义对国家创新体系的早期探索。首先，对创新、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进行概念的重新界定与扩展。其次，阐述经济增长的产业特定性与主导产业的领先市场原理。再次，阐述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宗教格式塔转换对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重要性。最后，论述重商主义是国家创新体系最早的创立者，并以塞拉为例加以说明。该章的结论是：重商主义是历史证明了的强国富民的学说。

第四章至第六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以历史上当之无愧的优胜者——英国、美国、德国为例，阐述它们具有何种国家创新体系，又是如何进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英国成功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在重商主义政策的指导下，全力打造了当时的主导产业——纺织业的领先市场；英国的衰落是由其国家战略失误导致创新缺失而造成的，如路径依赖导致技术锁定，单方自由贸易阻止了技术变迁的脚步，货币资本输出导致大量“剪息票”者，企业小型化、教育绅士化也使技术创新无从谈起。美国部分主要阐述美国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实现技术领先。其关键原因在于建国初期美国就提出了培育国内市场规模的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国家战略，并很好地贯彻了它。德国的成功在于：德国体系的特点是国家统一与创新型国家建设并行；铁路建设具有独特的意义；国兴科教思想独树一帜。同时，以有机化学工业发展为例，阐述德国是如何践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可以说，在这些国家的兴起中，主流经济学作用甚小，而在今天，经济学以及经济思想史几乎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家谱学，这不是对历史的无知，而是要踢掉梯子，以免发展中国家顺着它们曾经使用过的梯子爬上来。

第七章为本书的结论部分。首先提炼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经验，然后指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软肋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书的主要观点如下。

(1) 经济学无国界，但是经济学是有阶段性的。经济学富含意识形态，“只有一个经济学”的看法要么是对经济思想史的无知表现，要么是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设置的“富国陷阱”。历史表明，自文艺复兴以来，在经济学中就形成了一种由重商主义、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美国制度主义、熊彼特经济学等一直延续到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思想传统。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之所以相继崛起，就是因为当它们处于穷国地位时就接受了这种“替代性教规经济学”的基本法则并创立了国家创新体系。演化与创新经济学更适合于分析像中国

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2) 国家创新体系与创新型国家建设不存在最优模式。由于情景脉络特定，国家在“产业组合”上的差异，强烈地影响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态。但各种模式的国家创新体系有其共性：经济理论上，遵循重商主义传统；国家政策方面，注重建设均质的、统一国内市场的区域政策，注重培育主导产业的产业政策。

(3) 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是主导产业的领先市场建设。经济增长具有产业特定性，因而高质量的或报酬递增的主导产业才是强国富民所必需的。创新型国家的变更，根本原因在于主导产业在时空上的转移。主导产业的领先市场建设要从高新技术培育和市场建设两个方面展开。

(4) 国家的作用。优势是人造的而不是比较优势的结果。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对抗作为 20 世纪的突出特征只是一种相对新的现象，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创造运行良好的市场，尤其在搜寻主导产业和建设领先市场方面，国家的作用尤为重要。

作 者

2013 年 1 月

目 录

丛书序一

丛书序二

前言

第一章 导论：创新与国家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3
第三节 思路与研究方法	5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6
第五节 文献述评	8
第二章 比较与历史创新体制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架构	18
第一节 演化经济学方法论与演化博弈论的比较	18
第二节 历史与比较创新体制的学术特征	25
第三节 历史与比较创新体制视角下的创新型国家研究框架	31
第三章 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早期探索：重商主义	38
第一节 创新型国家概念界定及其主要动力	38
第二节 哲学宗教格式塔转换	50
第三节 重商主义：国家创新体系创立者	54
第四节 塞拉：国家创新体系思想第一人	59
第四章 英国体系的盛与衰	63
第一节 英国的国家创新战略	63
第二节 纺织业为主导产业的领先市场建设	66
第三节 自由贸易是催生工业革命还是相反	71
第四节 特许公司推动英国走向世界	78
第五节 英国创新体系的衰落	79
第五章 美国体系与美国经济的跨越性发展	95
第一节 美国学派：美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	95
第二节 两次英美战争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起点	104
第三节 国内经济大循环——培育国内市场规模	109
第四节 闭关锁国为什么还能技术领先	111
第五节 排斥 FDI，避免冲击国内产业	119

第六节 农业创新体系.....	123
第六章 德国复兴的国民体系.....	130
第一节 德国经济学中的国家体系传统.....	130
第二节 德国统一与创新型国家建设并行.....	138
第三节 铁路连着你和我——创新体制的国家“联合”	142
第四节 国兴科教.....	145
第五节 有机化学工业：协同创新的一个例子.....	152
第七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168
第一节 三个国家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经验总结.....	168
第二节 鉴古知今：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政策建议.....	173
参考文献.....	179
后记	185

第一章 导论：创新与国家

实际上，上层（资本家）社会就像旅馆一样，的确总是客满，但旅客总是变换。

——熊彼特，1934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历史就像是一座蕴藏着丰富的间接经验的大仓库。当你分享这些经验时，选择适当的角度是十分关键的。我们不但应该在事后看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和历史趋势，还应该想象得出历史能够向与我们同时代的难以把握现实发展倾向的人们展示什么。“1500 年突然发生了一次大转移，（经济）中心从威尼斯转移到安特卫普，然后又在 1590~1610 年转移至阿姆斯特丹，1790~1815 年伦敦处于领先地位，1929 年（经济）中心转移至纽约。如果纽约失去中心地位——但我认为它不会——世界将不得不寻找一个新的中心”（费尔南·布罗代尔，1977）。意大利城邦、葡萄牙和西班牙、荷兰联合省、法国、英国、美国分别享有 15~20 世纪每个世纪的世界霸权（图 1-1）（查尔斯·P. 金德尔伯格，2003）。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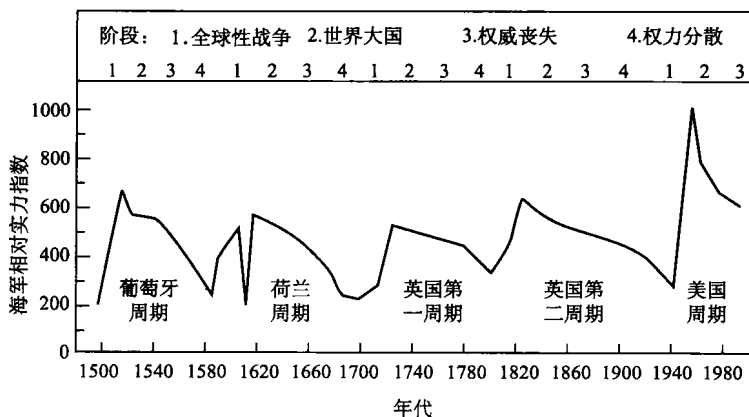


图 1-1 莫德尔斯基的全球权力长周期

资料来源：查尔斯·P. 金德尔伯格，2003. 世界经济霸权 1500-1990 年. 北京：商务印书馆：76.

乔尔·莫基尔在其论述技术进步的优秀著作《财富的杠杆——技术创新与经

济进步》中，多次提及卡德维尔法则：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一直保持技术创新的显著优势长达两代或三代甚至更长的时间（莫基尔，1990），但是卡德维尔本人没有为这种规律性提供任何理论基础（查尔斯·P. 金德尔伯格，2003）。布罗代尔的论述也尚未解决一个问题，即一个中心向另外一个中心转移通常是如何实现的（查尔斯·P. 金德尔伯格，2003）。

荷兰历史学家简·罗米恩提出“不规则发展法则”，认为“在发达程度较高的、新的文明阶段处于领先地位的任何国家，当它达到一个临界点或界限时，要超越这一界限向前发展是极其困难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类发展的下一步不得不在其他地方迈出”（查尔斯·P. 金德尔伯格，2003）。马歇尔则关注经济增长和企业的跨时行为，他提出了一个“三代人的重重障碍”模型。这个模型是说，第一代企业家可能是朝气蓬勃、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他发现准地租的某一个来源；他的儿子可能消极被动一些，很可能把准地租误认为是地租；被惯坏了的、懒惰成性的孙子肯定会犯这个错误，准地租被竞争掉，至此，一个周期结束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1875~1955年）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有同样的精英循环的论述：第一代企业家赚钱；第二代介于企业家和剪息票两类人之间，第三代就只剩剪息票的人了（埃里克·S. 赖纳特和贾根良，2007）。马歇尔将这种现象称为“富不过三代”（法格博格等，2009）。布罗代尔与沃勒斯坦则用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来阐述：发展围绕着核心向外扩展，先是半圆形，然后是圆形（沃勒斯坦，1998）。演化经济学隐喻于生物学的“物种异地形成”，认为技术领先国家会因技术锁定而路径依赖，新的技术在异地路径创造。^①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但绝不会简单地重复。“阶段论”有很多，但是不会自然而然地上升到下一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言必提当今的美国是不对的，正确的态度是言必称过去的美国。但美国的过去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这还不可怕，可怕的是发达国家把它们过去人为地歪曲后，告诉你发达国家的过去也历来如此；可怕的是我们接受了“历来如此”的观点。

国别之间的竞争是客观而长久存在的；国别之间的竞争不在于绝对量而在于相对地位，赶超就是这个意思；国别之间的竞争不是各自独立地发展，而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更有甚者，先进者要阻止后进者的上位行动，落后者也要模仿、学习甚至是盗取，总之，国别之间的竞争不乏相互的倾轧；国别之间的竞争同样存在熊彼特式的竞争（通过创新进行竞争），即创新型国家建设及其竞争。创新型国家在起步时就已经奠定了基础，做好了准备。

^① 贾根良教授首先运用“物种异地形成原理”分析思想史中的学说转移。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创新是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由于综合国力竞争的主体是国家，其实质是国家总体实力的较量，竞争是在从企业到区域（或产业）再到国家的多个层次上展开的。各个层级的竞争方式不同，因而企业虽然是微观创新的主体，但却负担不起系统整合的作用。必须更加重视政府的引导功能、系统整合功能和作为宏观创新主体的功能，这才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完整要义。英美崛起、德日持续不懈的百年赶超，其核心就是国家创新之争。

一、学术意义

首先，随着演化经济学发展形成燎原之势，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倾向于使用演化经济学方法论。问题是演化经济学也处于成长中，没有形成一种共同的学术研究方法。缺乏具体的方法论，即缺乏标志性的方法论或者批评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多于自身方法论的建设。一方面无法统一演化经济学的各个学派，另一方面，容易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攻击。

霍奇逊 1993 年曾按照“系统发生论”和“个体发生论”，以本体论、方法论和隐喻这三个标准对使用演化方法的经济学家进行分类。他认为“接纳新事象、反对还原论（novelty embracing, anti-reductionism）”，即 NEAR 才是演化经济学。“与霍奇逊对演化经济学严格划界的做法相反，维诺曼认为，演化经济学不应限制聚集在其旗帜下的经济学流派的数目，他反对把演化经济学看做是与新古典经济学所代表的任何东西相对抗的看法”（贾根良，2002），甚至认为演化经济学不应排除新古典经济学。贾根良（2009）则用“是否能处理新奇”的单一标准来界定演化经济学，否定了所谓“新古典演化经济学”的提法，为演化经济学以“创新”为主要研究对象奠定基础。可见重新梳理和统一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是本研究的理论意义所在。本书的比较与历史创新体制，既是演化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总括——国家创新体系，同时又是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建设（王晓蓉，2006）。

其次，发达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借鉴意义不大。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包括对当今发达国家创新体系的静态描述，也包括对当今发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过程的动态分析。探究在贫穷国家成功实施创新体系所必需的条件与理解如何刺激早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经济，是两项不同的课题。“然而，如今这种理论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对国家创新体系所做的许多研究都是事后发生的，也就是说，大多数研究针对的都是已经成熟、已经多样化和成功的体系”（Lundvall，2002）。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成熟国家创新体系的现在和未来，而且还要关注它们的过去，确定这种方法的必经之路及其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起源。换句